

傅译莎剧《哈姆雷特》与艾略特《荒原》“52条”： 进入莎士比亚的另一种方式

陆楠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傅光明莎士比亚诗剧译本已成为近年来莎剧汉译的现象级事件,其重要贡献之一即唤起人们对于莎剧背后复杂的西方文学文化传统的重视。以《哈姆雷特》译本为例,其注释与艾略特《荒原》自注52条呈现出高度的同质性与同构性,体现出译者对原作文化背景的精准把握,而莎士比亚恰是艾略特敬重并高频引用的诗人,《荒原》之晦涩难懂及艾略特对于“传统”之强调无疑挑战了我们对莎士比亚的通俗化理解。傅译亦通过导言等“再注释”方式,从莎士比亚所处时代出发解释人物行为的动机,深入阐释莎剧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为哈姆雷特“复仇”提出不同于前人的见解,在国内《哈姆雷特》研究中亦属首创。

关键词:莎士比亚;傅光明;《哈姆雷特》;艾略特《荒原》作者注

中图分类号: H059

傅光明莎译自2014年出版第一部《罗密欧与朱丽叶》,迄今续译续出18种,在学界和读者群中获“傅译莎”之称,不论与经典莎译(朱生豪、孙大雨、梁实秋等译本)相比,或置于近年来鱼龙混杂的莎剧译本之中,傅译莎都显示出在中文世界重建莎翁形象的野心。这体现在语言文字风格上追求“原味儿”的努力,试图纠正过分“美化”“雅化”莎剧语言的倾向,尽可能还原莎剧丰富、多变,贴合人物形象与时代背景的语言风格;同时,傅译在正文以外配备多视角准文本,其注释的体量和深度,在中译本中堪称翘楚,每部译作附一长篇导读,深入、细致介绍剧作诞生背景、故事原型,并对人物与剧情进行卓有新意的解读,开创性的见解建立在扎实的英文文献资料之上,为读者阅读莎剧提供了登堂入室的门径和探莎路上更为精准扎实的装备;以此为基础,注释与导读所关涉者,因其体量与质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文世界莎剧的面貌,唤起人们对莎剧背后复杂的西方文学、文化传统的重视,也促使翻译界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莎剧翻译史。

一、傅译《哈姆雷特》注释与《荒原》作者注的同构性

傅译莎注释数量庞大,内容翔实,《哈姆雷特》

注释共计300条,超过多数《哈姆雷特》中译本。笔者注意到,其注释与英国现代主义诗人T. S. 艾略特为其长诗《荒原》写下的著名的“52条”自注有很强的同构性。

1922年10月至11月间,《荒原》在《标准》(伦敦)和《日晷》(纽约)面世。评论家对诗中耐人寻味的修辞和挑战意味表示困惑与愤怒,艾略特将之归咎于对诗中用典的误读。瑞恰兹断言《荒原》缺乏信仰,更激起艾略特直接反击:“至于我的这首诗,我赌上性命也看不出它如何和一切信仰完全‘割裂’……疑虑、不确定、徒劳,这一切感受对我来说指向的恰是这一轻松割裂的反面;疑虑与不确定仅仅是信仰的一种形式。”^{[1]192}不久后,《荒原》单行本问世,艾略特补写52条注释附于正文后,成为日后阅读这首长诗不可忽视的“准文本”。增补注释既是针对外界对诗作以旁征博引得哗众取宠之诘责的某种反驳,也间接道出诗人此时的诗歌理念。多年后,尽管由于诗歌理念的变化与写作风格的成熟,诗人一度考虑删除这些注释,“但是现在再也不能把它们去掉了。它们几乎比这首长诗更有名气了。”作者注已成为解读《荒原》的关键钥匙,好比遭遇崎岖不平平时支撑前行的拐杖,荆棘丛生的黑暗中投来的一束光亮。

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后来谈到这些注释时,特

收稿日期:2022-08-31

作者简介:陆楠楠,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现当代文学。

E-mail: lunnly@163.com

引文格式:陆楠楠. 傅译莎剧《哈姆雷特》与艾略特《荒原》“52条”:进入莎士比亚的另一种方式[J].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3): 21-25.

别针对诗歌的“晦涩”做出阐述,认为“最使我倾倒的诗,是我初读时根本不懂的诗;有的诗我至今还不能肯定说我已经懂得……”紧接着,艾略特举例说“比如莎士比亚的诗”^[2]。这也是此段诗观中为论证观点所举的唯一例证。这无疑包含着诗人的谦逊,对于英语诗歌传统的敬意,但同时也可能是一句简单的实话。毕竟,艾略特与看似已被浪漫主义诗人集体抛弃的莎士比亚确有灵魂相通之处。

本文将“52条”与傅译《哈姆雷特》注释联系在一起,当然并非因其都是注释,也不仅由于艾略特对莎士比亚的偏爱,而是在这些注释被当做整体加以审视时,笔者发现两者具有无法忽视的同构性。

为便于理解,本文以傅译《哈姆雷特》为例,梳理其注释内容构成,以示其与“52条”之间的对照关系。傅译注释内容涉及文化典籍、风俗、历史、地理等典故,还包括与此前译本的对照、联系上下文进行解释等。本文分门别类整理如下:地名:10条;历史人物:9条;《圣经》等基督教宗教典故:55条;古希腊罗马神话、文学典故:35条;与其他译文对照:28条;对语句进行语境说明(认为读者可能由于不了解情境而做出的解释、补充)及其他说明性文字(包含俗语、俚语等)105条。

《荒原》“52条”涉及经典文本包括《圣经》、古希腊神话传说、佛教典籍、莎剧、同时代文学作品、人类学著作等。本文分门别类整理如下:《圣经》等基督教宗教典故:8条;古希腊罗马神话、文学典故(包含奥维德《变形记》、维吉尔、萨福诗歌等):7条;中世纪神话传说、文学典故:6条;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典故(含但丁、莎士比亚、约翰·韦伯斯特等):12条;17世纪—19世纪文学典故:6条;印度及佛教典故:3条;其他(同时代文学、人类学、历史研究、诗内互文关系解释等)10条^①。更为直观的比较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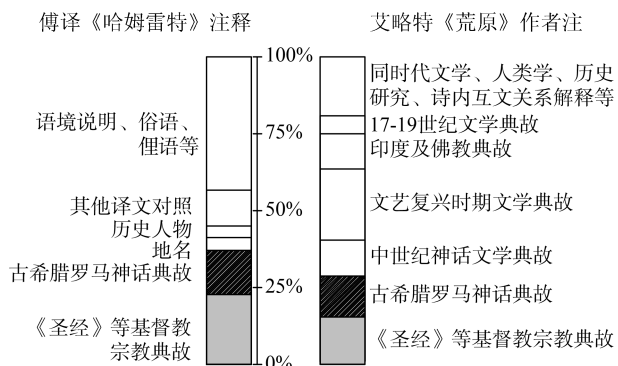


图1 两希传统相关典故在傅译《哈姆雷特》与《荒原》作者注中所占比重

如图1所示,两希传统相关典故在傅译《哈姆雷特》与《荒原》作者注中所占比重均为三分之一左右,构成注释的基石。这是巧合还是必然?作为

阅读朱生豪等经典译本进入莎士比亚世界的读者,恐怕会惊讶于艾略特深邃晦涩与莎士比亚“通俗”“易懂”之间何以产生关联;但傅译大概会让诸如此类的疑虑烟消云散。

具体例证为:以《荒原》第23行自注为例,原文“死去的树不能给你庇护,蟋蟀不能使你宽慰”,艾略特自注2:参阅《旧约·传道书》12:5。诗句所使用的意象与营造的意境,皆出自《圣经》典故:“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3]若无相应知识储备,艾略特的诗句便会被解读为无根的陌生化手法,这恰是诗人最为反对的,用个人诗艺捉弄读者之行径。但若对应互文,按图索骥,便能够理解诗句其来有自,“蟋蟀”与“蚱蜢”为同一英文词的不同译法,而“死去的树”与“蟋蟀”实则借《圣经》描述了“人归他永远的家”,即老之将至,人之将死的苦痛。

这类注释在傅译《哈姆雷特》中俯拾即是,此处略举几处:“脆弱,你的名字女人!”傅译注释“《圣经·新约·彼得前书》3:7:做丈夫的,你们跟妻子一同生活,也应该体贴她们在性别上比较软弱。”哈姆雷特另一处独白:“上帝啊,上帝!在我看来,人世间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那么的令人讨厌、陈腐不堪、庸俗无聊、一无是处!”傅译注释为:“《圣经·旧约·传道书》1:14:我观察了世上的一切事;一切都是空虚,等于捕风。”一段独白涉及《圣经》和古希腊神话十余处,若无注释,“脆弱”与性别何以产生关联?哈姆雷特的厌世表达难道只是莎翁一时兴起?“天风”(winds of Heaven)这样丰富的意象也会被简单误读为不同文化语境中的陌生化表达,背后的文化意涵会被完全忽视。

两位作家都属于欧洲文学那个巨人般庞大久远“伟大的传统”,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未曾须臾断绝。莎剧爱好者大抵见识过英美学者为莎剧与莎诗所做的连篇累牍、远超作品自身篇幅的注释,叹为观止、望而生畏之余,也不由心生疑窦,莎士比亚虽然被冠以“莎翁”之名,但多数中译本注释寥寥,似乎仅靠剧本和诗歌正文就足以理解莎士比亚。中文世界鲜少以“晦涩”来形容莎剧和莎诗^②,换言之,在我们的莎士比亚接受史中,作品背后复杂深邃的西方文学与文化传统被部分忽视了,而那正是莎士比亚在西方文学语境中之所以伟大的重要缘由之一。

此外,莎士比亚作品本身也在艾略特庞大的互文库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是《荒原》“用典”的主要来源之一。

“那莎士比亚式小调,最风雅,最明白……苔丝德蒙娜是涂了色的小玩偶,罗密欧把他的朱丽叶来爱——还有些恋爱的人儿在,倒也不难猜,但只怕

来到了现在,倒要把别样的灰熊舞来跳,你听老哈姆雷特说‘to be, or not to be’,那——就是莎士比亚式小调。”^③

莎士比亚给了艾略特灵感,也是艾略特在宗教信仰、文化身份追寻过程中确认自身的重要参照物。1919年,艾略特撰写长文《哈姆雷特与他的问题》^④[4] 阐述《哈姆雷特》,后收录于艾略特第一部诗歌与文学批评集《圣林》,其重要性不亚于人们熟知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在文中与当时新出版的两部莎剧研究专著进行深入对话。他认为它们改变了莎研过分注意哈姆雷特作为主角的重要性,将注意力转向剧本的整体性^[5]。艾略特还在论文中提出重要的文学批评术语“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并将哈姆雷特的轻率举动、重复行为、不断出现的双关语,解释为人物发泄情感的方式,而非实施计划、刻意佯装以达成复仇目的。无论艾略特本人,还是他所评述的两位批评家,似乎都对《哈姆雷特》人物情感变化、性格塑造在整体性上能否自洽持怀疑态度,并进一步上升到质疑剧作的艺术性。“客观对应物”很快受到叶公超、叶维廉等诗歌研究者的关注,且由此引发诗学界对这一概念的阐发、质疑、回应与实践。不过,艾略特此番灵感的渊源是来自莎士比亚戏剧,此事并未引起中国莎剧研究的重视。

傅译注释提供了莎士比亚为何频繁出现在艾略特诗中的某种旁证。这既是因为莎士比亚所建构的辉煌的诗歌、戏剧世界之夺目光彩,对艾略特来说,恐怕还有一重特殊意义,即莎士比亚与传统之间的关联。在《传统与个人才能》等艾略特的理论文章中,他将真正的诗人定义为连接读者与伟大传统之间的“介质”^[4]。莎士比亚属于这一链条,是艾略特心目中堪称“诗人”的“介质”,并重塑了这一伟大传统。这“重塑”绝非凭空而来,莎士比亚传承并深刻体现了欧洲文学传统,以艾略特的诗歌观念来看,承袭至关重要。而艾略特亦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介质”,让链条经由他继续延伸下去。

艾略特的传记作者曾引述批评家约翰·杰伊·查普曼的观点:艾略特与之抗争的朽坏实质是美国无孔不入的商业思维^{[1]27}。莎士比亚曾是艾略特抵御他所在时代的腐朽、去道德化,重建个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思想资源。译者潜心阅读、尽可能去接近语义层面丰富历史语境的翻译行为本身,亦具备这样的抗辩力量。

二、注释与“再注释”

仍以傅译《哈姆雷特》为例,注释共接近300条,涉及古希腊罗马神话的注释约占七分之一,与《圣经》文本相关注释多达55条,占据全部注释五

分之一以上。不仅占比之高令人瞩目,且注释者标示出作品与两希传统之间的深入关联。诚然,此事也是译者的选择。译者尽其所能详尽注释,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读者也不可避免受到译者视角引导。

傅光明在正文翻译之外,又撰专文一篇,附在译文后,勾勒莎士比亚所处时代政治、宗教文化背景,并结合其生平及不同时代莎评,详细阐释莎剧与《圣经》及基督教传统之间的密切关联,此举亦属译者对译注进行再度阐释,姑且称之“再注释”。译者试图去做一件原本不需要做的事——面向普通读者的莎剧英文本也包含大量注释,但关于《圣经》的注释数量和占比通常不会达到傅译的程度。这既是由于西方读者对于两希传统较为熟悉,此外,与《圣经》之间的关联是傅光明理解莎剧的重要视角之一,这一视角本身就具有建构性。毋庸讳言,它体现出译者的某种执拗,也对既有莎译导致的莎剧肤浅化进行了刻意矫正。莎剧的丰富性给予人们足够的空间去施展拳脚,历史学学者、民俗学学者、社会学学者,可能会为《哈姆雷特》做出全然不同的注释;古今、中西之间的时空距离导致极大的视角盲区,要越过横亘的时空障碍去理解莎剧,并非易事。

即便已享有作为译者的特权,傅光明仍然试图解释为何《圣经》于注释中频繁出现。不难揣测,这一行为背后的“假想读者”曾给译者怎样的压力和动力。以现有莎译本读者为基础,如是想象并不过分。“再注释”专辟一节,即第四小节:《四、〈圣经〉:在宗教中捕捉灵感》,分三个层次,逐层递进阐述《圣经》与莎剧之间的关联^[6]。第一个层次,是莎士比亚所在时代特殊的宗教背景:从1517年马丁·路德引发的宗教改革,到英国从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一世都铎王朝血腥的宗教变革史,直到詹姆士一世时期,英文版《圣经》的编纂和普及;第二个层次,是从基督徒的视角诠释“哈姆雷特为什么不立刻报仇”,也即关于此剧历来众说纷纭的“延宕”问题。首先是《圣经》在戏剧结构层面的投射,如撒旦的引诱,伊甸园秩序被打破的故事框架;其次,是剧作与《圣经》意象的重叠,如害死先王的“毒蛇”“该隐杀弟”的原型等;之后,译者截取人物台词中与宗教信仰明确相关的语句,再次论述不同人物采取行动时背后的宗教因素,主要集中在先王、叔父与哈姆雷特三个人物形象之上。

这三个人物都曾在对话或独白中,反复表达过对于宗教救赎的严肃考虑。在先王看来,“最可怕的”并非被谋害致死,而是新王“甚至把我临终忏悔的机会也给剥夺了,我还没有领圣餐,没有接受临终的涂油礼,我所犯罪恶的账也还没有了结,只好到上帝面前去清算了”。而争夺王位事件中表现得如此残忍、镇定的新王本人,也曾在神面前忏悔。

傅光明将哈姆雷特“延宕”归结为“等待”,他认为哈姆雷特是在等待最合适的时机,以便将叔父直接送到地狱。剧中三种复仇形式各不相同,哈姆雷特的复仇行动最为复杂,过程尤其艰辛,最终搭上性命,但人物的每一次犹豫都能在文本内部找到自洽的理由。他没有莽撞地复仇,没有选择不择手段的方式,后世读者认为最好的复仇时机——新王独自祷告时,恰恰是哈姆雷特绝不可能采取行动的时刻,关键原因之一便是如此一来,即便夺去叔父的生命,也可能将对方送往天堂,而他和父亲却会由于复仇行为被打入地狱。

译者野心还不止于此,“无疑,哈姆雷特是要向世人昭示,他的复仇出于要重建‘上帝之国’的公义。他要以一种耶稣背负十字架的自我牺牲,救赎自己的同时,去救赎世人。”^{[7]271}这是否符合莎士比亚的初衷?事实上,莎士比亚在创作中对宗教信仰有着明显的警觉性。剧作家生活的时代,圣礼正在经历一场变革。英国国教的和解运动纯化了天主教教义,七项圣礼被减为两项,仅剩洗礼和圣餐,炼狱相关的教义也被废除。老哈姆雷特的鬼魂自陈在炼狱(天主教的概念),而年轻的哈姆雷特则是在威登堡求学,也即马丁·路德的家乡,宗教改革的发源地^{⑤[7]23-24}。宗教信仰的代际差异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哈姆雷特的决断?显然,宗教变革体现在剧作家对于人物的设定上,不宜轻下断语。读者仍可持怀疑精神看待上述观点,但就“延宕”的分析,来自对文本的深入细读与梳理,与剧情发展逻辑严丝合缝,令人信服;推敲、论证过程行文可谓典范,足备为一说。借用艾略特的诗句,“我将借古典的信仰,击退这恼人的放浪”,“对艾略特与但丁而言,通往天堂的路没有捷径:他们都必须用脚丈量地狱之深,也必须捱过炼狱之苦。”^{[1]89}这或许也可用来描述莎士比亚本人及其笔下哈姆雷特所面对的情境。

最后,译者论述进入第三个层次——与史上哈姆雷特“延宕”复仇的其他经典论述对话,将译者观点嵌入一千个哈姆雷特之中,包含歌德的议论、弗洛伊德的阐释等。前人或从性格、命运角度,或从心理学角度解读人物行为。对于身处基督教传统的歌德等阐释者来说,戏剧的宗教背景或许不言自明。吸引他们注意的,是在同样背景之下,哈姆雷特为何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对笔者来说,傅光明的解读并未提供标准答案,这也是“再注释”第三个层次中译者本人反复强调的;其真正的贡献在于,它提示读者关注中文语境莎剧阐释中长期缺席的宗教视角。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将《哈姆雷特》完全放在宗教情境下进行解读,可能造成新的遮蔽,但任何真知灼见都必然蕴含偏见。傅光明的解读提供了异于其他视角的洞见,在“延宕说”一统天下的国

内莎学界更具有不寻常的意义。

三、结语

近现代以来,与其他领域的西学研究同步,我们对莎士比亚的译介也已建立起成文或不成文的传统,朱生豪、孙大雨、梁实秋等早期莎译者贡献了开创译本,使得莎士比亚剧作甫抵中国即在文学界引发极大反响。与此同时,与近百年来学术史建构同步,早年莎译本被过度经典化,以至于后来者只得在一些定论面前亦步亦趋,造成诸多传播或研究过程中的缺憾。经典译本普遍有将莎剧中俚俗一面“雅化”的倾向,同时,又对剧中大量历史、宗教、政治等背景视而不见,将复杂的莎剧平面化、简单化,这不可不说是特殊情境之下翻译实践所遭遇的悖谬。据学者统计,朱生豪《哈姆雷特》译本中神话和宗教意象意译失象之处为10处,音译32处(其中6处有译者注释),意译传象仅为6处,直译6处,神话宗教典故在翻译中多半失传^[8]。学术界真正意义上的译介和研究并未裹足不前,打破经典译本“神话化”可说正当其时,历史不应是脚下羁绊,而应成为不断更新的起点。

傅译从注释到再注释,都提示我们:莎士比亚对中国读者来说或许只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人人都知晓莎士比亚,但这种“知晓”在多大程度上只是想象?对于艾略特这位以“晦涩”风格著称的现代主义诗人,莎士比亚仍是理解其精深诗艺必须经过的巨大屏障。当那些精彩卓绝的剧情已为后人熟知,作家编织故事的诀窍也被逐一破解之后,“莎士比亚”变得单薄,看似一览无余;但倘若深入莎剧所处的欧洲文学传统,一窥孕育莎剧的腹地,经历漫长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或许才能真正意识到我们对莎剧的理解是肤浅和表面化的。这倒不是说作者使用了特殊障眼法或繁复技巧,而是在那些被“常识化”的知识背后,还包含着更多不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层峦叠嶂的典故。如果完全忽略这个层面,或许只能看到“雕虫小技”,大概也无法理解艾略特为何对莎士比亚推崇备至,更不可能真正理解托尔斯泰为何不喜欢莎士比亚,以及他们之间实质性的分歧究竟为何。

本雅明在《译者的职责》中曾说:译作虽赖原作而生,但并非听命于原作。通过译作,原作的生命得到及时、不断更新和充分扩展。本雅明的理想译本是《圣经》隔行对照译本。傅译《罗密欧与朱丽叶》2014年在台湾出版时,亦采取“左页英文,右页中文”,行行对应的排印方式,可谓“理想译本”践行版^{⑥[9]}。如其所言,好的译作会延展原作的生命力,翻译从来不是两种僵死的语言之间了无生机的等式。傅译在注释中大量引用原文,并与经典译本相

对照,向读者解释缘由,都彰显出译者对于翻译质量锱铢必较的追求。翻译的历史,原本就是译者与读者合力追求“真实”,追求“还原”的历史。

通常我们在谈到注释时,都必须区分作者本人和编者所做的注释。前者理所当然作为“准文本”成为正文的一部分,在任何版本中都无法被删除或忽视。译者的注释在价值排序中相对靠后,然其重要性未必亚于前者;精当的译注尽管无法独立存在,但同样拓宽了原文深度,提供了共时与历时两个方向的参照,其延展的长度和宽度已足以使译本成为另一本书。中文世界亟需详尽、贴近欧洲文学传统的译本。就注释的精当与深度来说,傅译本可谓鹤立鸡群。正如阅读《尤利西斯》时,几乎不能离开那些导读本和连篇累牍的注释,在阅读更古老的西方文学时,我们需要的注释也许不是更少,而是更多,如此,才能避免凌空蹈虚,误入歧途。

注释:

- ① 弥尔顿《失乐园》以圣经故事为原型,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主题为主人公归信的心灵历程,故归入广义的《圣经》与基督教宗教典故。
- ② 莎士比亚诗歌中那些悬而未决的谜题是例外,但也是基于莎士比亚作为作者的隐匿性,主要围绕他生平资料欠缺而产生的谜团展开,是借助作者生平阐释作品的尝试中遭遇的困难。
- ③ 《那莎士比亚式小调》是一首真实存在的歌曲,1912年在纽约发行,拉格泰姆爵士,据记载,艾略特喜爱在这曲调伴奏下跳当时在美国流行的狐步舞和灰熊舞。鉴于“to be or not to be”傅译与

引用处翻译不同,此处引用时保留了英文原文。

- ④ 此文最初发表于《雅典娜神庙》,1919年9月26日,原文题目为“Hamlet and His Problems”。
- ⑤ 傅光明也曾谈及哈姆雷特剧中宗教信仰的代际差异,但与本文得出的结论不完全相同。
- ⑥ 本雅明在文章中推介的理想译本是《圣经》隔行对照译本。傅译《罗密欧与朱丽叶》2014年在中国台湾出版时,亦采取“左页英文,右页中文”,行行对应的排印方式。

参考文献:

- [1] 林德尔·戈登. T. S. 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M]. 许小凡,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
- [2] T. S. 艾略特. 观点[M]//裴小龙,译. 诗探索(辑刊),1981(7):105.
- [3] T. S. 艾略特. 荒原[M]//汤永宽,裴小龙,等,译. 艾略特文集·诗歌.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104-105.
- [4] 李赋宁(译注). 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 [5] T. S. 艾略特. 艾略特诗学文集[M]. 王恩衷,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10.
- [6] 莎士比亚. 哈姆雷特[M]. 傅光明,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237-284.
- [7] 乔纳森·贝特,多拉·桑顿. 英国黄金时代——莎士比亚的世界[M]. 刘积源,韩立俊,译.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
- [8] 段自力. 朱生豪莎剧翻译经典化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270-278.
- [9] 本雅明. 译者的职责[M]//本雅明. 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 李茂增,苏仲乐,译. 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7:64-65.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u Guangming's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s *Hamlet* and Eliot's Annotations to *The Waste Land*

LU Nan-nan

(School of Chines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s plays by Fu Guangming has become a phenomenon in the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field in recent years. One of it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s to arouse people's attention to the complex West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behind Shakespeare's plays. Take the translation of *Hamlet* as an example. Its annotations and 52 self-notes of Eliot's *The Waste Land* show a high degree of homogeneity reflecting the translator's accurate grasp of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original work, and Shakespeare is just the poet Eliot respected and cited frequently. The obscurity of *The Waste Land* and Eliot's emphasis on "tradition" undoubtedly challenge our popular understanding of Shakespeare. By means of "re-annotation" such as introduction, Fu interprets the motives of the characters' behaviors from the era of Shakespeare, deeply explains the Christian cultural background of Shakespeare's plays, and puts forward different opinions for Hamlet's "revenge", which is also the first in the study of *Hamlet* in China.

Key words: Shakespeare; Fu Guangming; *Hamlet*; Eliot's annotations to *The Waste Land*